



细究菲律宾向南海仲裁案仲裁庭递交的仲裁事项,可以看出行文多处试图掺入混淆概念的说辞,目的是想否定、抹杀中方主张的历史性权利,但反而暴露其无知和偏颇的各种破绽。

破绽之一是“断章取义,胡搅蛮缠”。

菲律宾在诉状中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从未存在历史性权利的说法。

这一诉求无疑是片面解读《公约》内涵。实际上,《公约》多个条款反映了“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水域”、“历史性所有权”等概念。其中,第十五条涉及海岸相

向或相邻国家间邻海界限的划定条款明确写道:“如果两国海岸彼此相向或相邻……如因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而有必要按照与上述规定不同的方法划定两国领海的界限,则不适用上述规定。”

《公约》第三部分“用于国际航线的海峡”、第四部分“群岛国”相关条款中,也对非沿海国的历史上的航行、通过权利做出了承认。

有学者认为,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可以认为是从《公约》有关“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水域”中折出,历史性权利也与《公约》一些条款的概念相互交错。可以说,《公约》为中国的主张提供了有力支持,而不是相反。

破绽之二是“罔顾判例,臆断法理”。

菲律宾声称,中国所提到的历史性权利“被《公约》的制定者明确拒绝并被《公约》废除”。菲律宾企图暗示历史性权利不应纳入国际法的范畴。

但事实是,无论哪一种权利都不可能突然地瞬间形成,今天所有权利都是对过去权利的继承、部分继承或参考性继承,历史上形成的权利无疑应当受到国际法尊重。

多起国际司法实践也为历史性权利的法律表达提供了例证。其中最经典的当属挪威与英国1949年的渔业案,这一案件与历史性权利相关,现已成为涉及海洋权益的经典国际司法案例。

挪威沿岸峡湾渔业资源丰富,自古以来是当地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而在上世纪初,英国装备拖网渔船出现在挪威海岸外海域,影响当地渔业,屡屡产生摩擦。1935年,挪威王室颁布敕令,依照

历史传统划定专属渔区。而英国认为,挪威划界方法没有依照国际法规定,划定区域超过范围,将挪威告上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作出判决,驳回英国的要求,判定挪威敕令划定渔区有效。其中重要一点原因是,挪威王室的敕令是依照历史上的划界体系,自1812年以来挪威政府已多次申明,这一事实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默认。法庭还指出,尽管挪威划定的部分基线明显偏离海岸,但这部分水域的取得归因于历史性权利。

除此之外,突尼斯-利比亚大陆架案、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丰塞卡湾案等司法案例都涉及了反映历史性权利的特性。丰富的案例也表明,“历史性权利”在国际司法实践中理应是一大考量因素。

破绽之三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仲裁申请中提到,菲方认为中国的

南海断续线缺乏同历史的联系,且声称中国对海域的历史性权利为2009年提出的新主张。但事实是,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中国人在南海上的航行、贸易、管辖已有两千余年历史,为历史性权利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吉普鲁在其著述《亚洲的地中海》中指出,东南亚被西方殖民者入侵以前,南海上的贸易由中国远洋船只开展,官员和船员都是中国人,中国贸易体系指导着那时的南海贸易规则。

唐代以来,中国对南海形成明确到位的管辖。南宋《诸蕃志》记载,唐朝把南海划归振州管辖,南宋为“琼管”,至明清两代,南海诸岛隶属于广东省琼州府。经过中国历朝历代官方与民间的推

动、培育、捍卫与维护,以南海为通道、为平台、为网络,带动周边国家走向共同的贸易和经济繁荣。

历史无从否认,也不容否认。无论是仲裁还是诉诸其他法律手段,通过何种伎俩包装、解说,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就摆在那里。裁决与否,历史以及历史赋予的权利都是铁的事实。

“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之昭昭。”菲方所提仲裁申请既无视历史经纬,又罔顾现实案例,恐怕只能与仲裁案本身一道沦为历史笑柄。 记者 张远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安哥拉政府发表声明 支持南海问题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

据新华社罗安达7月1日电 安哥拉政府1日就南海问题发表声明,支持南海问题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

声明说,安哥拉持续关注南海局势,安哥拉政府呼吁和支持南海问题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根据各方达成的双边协议和地区共识,通过直接友好磋商与谈判,和平解决领土和海洋争议。

6月30日,中国驻安哥拉大使崔爱民会见安哥拉外长希科蒂,希科蒂重申安方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有关立场。

香港法律界人士认为 历史判例说明海牙仲裁庭对南海仲裁案无管辖权

新华社香港7月2日电(记者 颜昊) 香港法律界人士认为,从荷兰海牙仲裁庭历史上类似案件的裁决结果看,荷兰海牙仲裁庭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没有管辖权。仲裁庭坚持己见并还将进行实体问题裁决,恐将对国际公法秩序造成严重破坏。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书记处6月29日称,仲裁庭将于7月12日公布菲律宾诉中国仲裁案的实体问题裁决结果。

香港独立非盈利法律团体亚太国际法学院主席、香港资深大律师冯华健2

日表示,从仲裁庭类似的历史判例分析,仲裁庭对此次涉及领土争端的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没有管辖权。仲裁庭坚持己见并还将进行实体问题裁决,恐将对国际公法秩序造成严重破坏。

亚太国际法学院6月初向海牙仲裁庭递交“法庭之友”意见书,从管辖权和可诉性两个方面质疑仲裁庭做出的对菲方诉求有管辖权的裁定。在管辖权问题上,意见书分析了2010年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争议单方面提起仲裁案的历史判例,质疑仲裁庭对菲律宾南海仲裁的

管辖权。

意见书分析认为,在查戈斯群岛仲裁案中,仲裁庭必须考虑双方争议的主体部分是否涉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解释和适用,毛里求斯对英国的指控是否涉及领土主权问题。

而在查戈斯群岛仲裁案中,仲裁庭最终以多数意见裁决,对于毛里求斯诉求的认定涉及岛屿归属权的问题,因为是岛屿的主权产生了相应的海洋权益,而这显然超出了《公约》的管辖范围。因

此,仲裁庭拒绝受理可能对群岛领土主权作出裁定的诉讼请求,即对毛里求斯主张英国不是有关海域的“沿岸国”、无权划设海洋保护区的诉求没有管辖权。

冯华健认为,菲律宾在仲裁案中提出的15项诉求,试图用割裂主权的方式单纯关注《公约》第121条(关于岛礁地位)和第13条(关于低潮高地)的规定,无视《公约》关于海洋权利的一系列规定,这显然是错误和违背《公约》本意的。

除了历史案例可以作参考外,冯华健认为,南海问题纠缠着复杂的历史和

政治问题。如果不对档案资料和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整体的、深入的研究,根本无法得出公正合理的结论,也无法为争端双方所接受。

“法庭之友”意见书认为,在缺乏充分的宏观共识作为前提的情况下,仲裁庭根本无力扮演南海有关争议适当裁判人的角色。在缺乏共识和适当裁判人的情况下,任何单方面提出的所谓符合国际标准的诉求都相当于一种“法律战”。菲律宾提出的仲裁案更像为了政治目的而炮制的“法律战”。

党领导国统区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阵地 ——访重庆周公馆

先辉历程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的曾家岩50号,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有一个响亮名字——“周公馆”。抗战8年,在周恩来领导下,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重要机构常驻于此,成为党领导国统区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阵地。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如今,在这栋砖木结构的老式院落里,珍藏着几十张老照片,真实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许多重大事件,仿佛让历史在这里驻足,向世人讲述着共产党人在极其复杂艰苦的环境中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追求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光辉历程。

民族脊梁

六七月间的西藏阿里,高原红柳花开得绚烂。沉默的冈底斯山,远远矗立在狮泉河镇地平线上,犹如一座丰碑。而孔繁森的名字,就深深镌刻在这片神奇的雪域高原,成为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成为流传在西藏干部群众心中最温暖的故事。

1979年,孔繁森告别山东聊城父老乡亲来到这里。从进藏第一天起,他就暗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神圣的土地,献给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尔后,他三次进藏,历时十载。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生的选择中,他的精神境界一次次得到升华。

在阿里烈士陵园,2015年进藏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陈锦讲解着原中共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一生的故事,刻在纪念碑前的对联述说着人们对他的敬佩:“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事业重如冈底斯山。”

“我是因为孔书记才知道了阿里。孔书记真的特别伟大。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和担当。”陈锦说。她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并自愿将原本一年的西部计划服

叩开周公馆厚重的大门,前院天井的墙上悬挂着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成员照片以及南方局组织机构图。其中一张周公馆平面图格外引人注目,它清晰地反映出当时这里复杂的斗争环境。

“门内有国民党高官,门外有军统局特务,这就是周公馆复杂甚至是险恶环境的真实写照。”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馆员郭亮指着照片告诉记者,中共代表初来重庆时,由于住房紧张,只能和国民党人共租一院。8年中,国共两党上层人士同进一大门,同住一个院,虽几无往来,却也相安无事,不失为国共合作期间的一段佳话。

周公馆大门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右行不足百米,就是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公馆。为了监视曾家岩,军统特务在路口开了一个小茶馆和修鞋铺,从早到晚轮流坐在这两间房屋中,目

光牢牢锁定在周公馆的大门上。而我党的同志,也对监视点的特务认得一清二楚,以至于后来双方彼此心照不宣,谁都知道谁是干什么的。

“在如此危险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党的领导人却从容不迫,在敌人的眼皮下纵横捭阖,有力领导了国统区的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示出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极高的斗争艺术。”重庆红岩连线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说。

后院是南方局的核心住址。左侧一楼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里面的摆设都是原样复原:十几平方米大小,办公桌椅、一张床、两三件旧式家具,非常简单。门口墙上悬挂着一组周恩来夫妇的照片:有周恩来在此办公的工作照,还有二人1940年在重庆纪念结婚15周年的留影。每张照片他们都要

带微笑,这样的笑容感染了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每一个人。

周公馆内设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文化组、妇女组和外事组等重要机构。团结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领导他们深入开展抗日民主文化运动是南方局最重要的斗争方式之一。

后院一楼过厅右侧的文化组办公室内挂满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与柳亚子、沈钧儒、叶圣陶等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的照片。其中,“雾季公演”和“香港大营救”两组照片弥足珍贵,真实记录了我党领导的这两次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力的文化运动。

1941年,由于蒋介石发动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使得重庆的革命活动处于低潮,所有行动都受到国民党特务打压,人们的心头都有着沉甸甸的压抑感。能够驾驭政治气氛

的周恩来选中了当时陪都重庆的话剧作为突破口,发起组织雾季公演,让文化界人士先后排演了《天国春秋》《棠棣之花》和《屈原》等剧目,使山城气氛终于活跃起来。这些剧目的珍贵演出照真实再现了当时情境和万人空巷一睹爱国剧目的场景。雾季公演持续4年之久,有100多部进步剧目在渝公演,这一时期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皖南事变后,为避免国民党的迫害,南方局帮助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疏散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及时把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安全转移回内地,史称“香港大营救”。周公馆文化组办公室内的照片就记录了当时的真实情境。在一张被营救出的香港部分文化人合影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虽然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逃亡,但这些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文化名人身上却显露出无比

的坚定。

郭亮说,整个“香港大营救”期间,我党先后营救出数百位文化人士,其中包括邹韬奋、茅盾、叶以群、胡绳、盛家伦、夏衍等文化名人,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中国保存了重要的文化力量。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领导进步人士共同革命是我党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周公馆里的老照片清晰地记录下这其中的一段历史。

当时,柳亚子、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等各界知名人士都是周公馆里的常客。周恩来甚至在这里亲手做过他的家乡菜“红烧狮子头”招待众人。周公馆条件艰苦,开饭时,桌凳、碗筷都不够,然而所到的客人都以为不意,反而谈笑风生,相聚甚欢。

记者 陈国洲 (新华社重庆7月2日电)

孔繁森：“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务期再延长一年。“来了阿里,亲眼见到当地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让我觉得能成为一名党员很光荣。”

孔繁森1944年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参军、入党,后来转业到地方。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当时担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欣然赴藏。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党的干部。越是边远贫穷的地方,越需要我们为为之去拼搏、奋斗、付出,否则,就有愧于党,有愧于群众。”

以此情怀,孔繁森在藏期间先后担任岗巴县委副书记、拉萨市副市长、阿里地委书记。赴藏前,他请人写下“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进藏后,他又留下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豪迈誓言。

在岗巴3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每到一地就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一起收割、打场、挖泥塘,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的情谊。

孔繁森第二次进藏后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任

职期间,他跑遍了全市8个县区的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乡办、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殚精竭虑。

在西藏最艰苦的阿里地区,藏族农牧民称孔繁森为“药箱书记”。粗通医术的孔繁森,看到藏族群众缺医少药,每次下乡都身背药箱,义务为群众防病治病。孔繁森对自己节俭,而对他人、对藏族同胞却是那么慷慨大方。在西藏工作的近10年间,他收养了3个藏族地震孤儿,省下的工资,大部分都用在补贴困难藏族群众身上。

而阿里的发展更是凝聚着孔繁森的全部心血。短短一年多时间,走访98个乡镇,行程8万多公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阿里发展的思路在孔繁森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他说:“率领群众致富,是我们的天职。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样,我们党才有威信,国家才有希望。阿里虽说偏僻落后,但发展潜力也很大。关键是要带领群众真抓实干。我有信心和全地区人民同舟共济、艰苦创业,共同建设一个文明、富裕的新阿里。”

他始终在努力实践着自己最喜爱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令人痛惜的意外发生在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的途中,因为一场车祸不幸殉职,时年50岁。人们料理他的后事时,看到两件令人心碎的遗物:一是他仅有的钱款——8.6元;二是他的“绝笔”——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这12条建议既包括了设机场、修国道、建电站等改善阿里能源交通“瓶颈”的对策,也涵盖有财政、民生、教育等群众所关切的问题。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令人欣慰的是,一批批阿里干部群众在“孔繁森精神”的激励下,已将这些遗愿——变为现实:

——进出阿里生命线的219国道油路贯通;

——昆莎机场建成通航,结束了阿里单一公路交通运输历史;

——狮泉河水电站和一批太阳能光伏电站投产,改善了阿里的能源条件;

——农牧民群众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

“将孔繁森精神传承下去,让更多年

轻干部感受到榜样的力量。”扎根边疆30多年的阿里地区政协副主席李玉建,曾是孔繁森生前的同事。在他看来,孔繁森精神已成为阿里干部群众努力奋斗的力量源泉,“我们很自豪地说,一批一批的干部群众通过努力,实现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边疆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

现如今,在阿里地委、行署所在地的狮泉河镇,繁森路和孔繁森小学这些名字,承载着人们对这位一心为民的党员干部难以磨灭的记忆。

来自阿里地区日土县的欧珠多吉,今年12岁,在孔繁森小学5年级1班就读。“孔爷爷是好人,老百姓遇到困难就找他。”欧珠多吉说。隔壁班的巴旦其美家住噶尔县左左乡,他告诉记者,从二年级开始,他就记住了孔繁森这个名字,“孔爷爷是阿里的书记,为我们建起了学校”。

这两个藏族孩子用藏汉双语郑重地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

“孔繁森在我的心里。”

清澈的高原阳光下,沿着繁森路漫步到河边。狮泉河静静流淌,见证着一个个代代相传的叙说。 记者 林威 汤阳 (新华社拉萨7月2日电)



孔繁森(右)在西藏阿里日土县过巴乡看望孤寡老人益西卓玛。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